



དུང་ཁོ་མཚུ་ཡི་ག་གི་འོ་ད་ཆེན་པོ་ལོ་རྒྱུ་ལ་བྱུང་བ་ལྷན་གསལ་གྱི་ད་བྱུང་གཞུང་ལ།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

A corpu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concerning the Tibetans

杨富学 李吉和 辑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K289/55

甘肅民族古籍叢書

དུང་ཁོན་རྒྱ་ཡིག་གི་བོད་ཆོན་པོའི་ལོ་རྒྱུས་གྲུང་བསྐྱུགས་ཤིང་བྱུང་ག་བྱས་པ།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

A corpu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concerning the Tibetans

第一辑 杨富学 李吉和 辑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

(第一辑)

杨富学 李吉和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29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宁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4 字数:230千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000

ISBN 7 226 02036 X/K · 333 定价:30.00元

序

二十年来(1978—1999年),我国学术事业呈现了全面复兴、蓬勃发展的趋势,成绩巨大,举世瞩目。单就我国的藏学研究而言,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藏族语言、藏族历史、藏医藏药、藏族历法,以及藏族的文学艺术、绘画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学科都出现了一批新著,引起国人注意,其中,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藏文写卷(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以及与吐蕃相关的汉文写卷的研究,也是在此时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与国外敦煌学研究接轨,并行发展,令人欣慰。

当本世纪初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年)、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年)等人先后潜入敦煌,将吾国文化宝藏巧取豪夺,席卷而去,遂使敦煌瑰宝流失异邦,西方学者得以垄断把持,居为奇货。其中就有约五千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巴黎和伦敦,吾国学者鲜有知其内容者,更谈不上插手研究了。于道泉教授(1900—1992年)实为吾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师从巴考(J. Bacot 1890—1967年)研修藏文,深知敦煌藏文写卷之重要,且受北平图书馆之委托,谋求复制、摄影该项写本,准备携回国内,供国人研究之用。当他转赴伦敦教书时,商之于大英图书馆大翟理斯(H. A. Giles,英国汉学名家,此人为该馆负责此项手卷之馆员),不期受到百般阻挠,根本不让接触,支吾搪塞,缠磨推脱,使其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于道泉先生生前每一提及此事,十分愤慨,痛心疾首。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怀着兴奋激情,回到阔别了19年的祖国。回到北平,立即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羨林教授合作,创设藏语组,是为国内高等学

府开展藏学研究之始。旋即 in 中央政府直接关怀下，在开办国内第一所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学院之时，建立少数民族语文系，而藏语专业被列为第一要务。除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藏语组师生并入外，又从全国若干高校中抽调一部分骨干，集中突击藏语，适应和平解放了的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需要。于道泉先生知道科研应该服从于当时的中心任务，只能将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心愿寄望于将来。60年代初，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古藏文研究班，专门培养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应该说这是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研究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极大，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已完全断绝，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料，也无从了解必要的学术进展信息。在这种环境下，若贸然提出开展此项研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审时度势，只好把于道泉先生慨然相赠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巴考等人的专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即P. T. 1286、1287、1288等若干写卷的法文译注解读本）藏诸篋中，以待时机，而在“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的讲座稿中，略加介绍而已。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众凶肆虐，群魔乱舞，学术资料横遭洗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真有今世何世之叹。迨下放“五七干校”，又以待罪之身，听候发落，惶惶然、茫茫然，不知如何了局。但，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和自我批判的问歇，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当，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住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间，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但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私心窃喜，以为没有白来“干校”一趟。后来，不可一世的“副统帅”机毁人亡，曝尸温都尔汗，我很快回到北京。一个偶然机会，接受一项外事任务（那时由牛鬼蛇神接触外事，真是不可思议），居然让于道泉先生负责，我来协助，去解读伊朗驻华大使馆委托的、在该国出土的一份藏文写卷。

后来我们方知道，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御妹阿什拉芙公主，当时担任着伊朗王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收藏了一批唐卡，而她的儿子尼果亲王更精此道，渴望从我国得到一些资料和帮助。好！于教授虽已73岁高龄，但乐此不倦，欣然接受此项任务，每天我们两人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北海西侧的文津街7号的老馆，不是今天在我们学校南墙外白石桥畔的紧邻新址）去查阅资料。回忆起来，非常有趣。他老人家本是北平图书馆20年代起就一直兼任的“研究馆员”，对馆内收藏的有关少数民族书刊非常熟悉，可是解放后总也得不到机会清理馆藏有关藏学的外国资料，这一次使他十分吃惊，从北图尘封已久的一大堆一大堆进口书刊中搜寻、掸土，从而读到许多老朋友如R. A. Stein（石泰安）、F. W. Thomas（托玛斯）、M. Lalou（拉露）、G. Tucci（图奇）以及李方桂、张琨等人的名字，又读到许多新作，更多的是许多生疏的新人、后起之秀：G. Uray（乌瑞）、A. M. Blondeau（布隆多夫人）、A. W. Sparian（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L. Petech（伯戴克）、山口瑞凤、今枝由郎等人的新人新作，都使他有时激动，有时沉思，有时扼腕叹息。我们连续不断地在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抄录资料。所幸，我们手中持有军宣队的特许入馆查书的证明信（读书成了特权，也算一绝）。当时，这三家号称中心的图书馆内，除了一些查阅旧报纸准备进行大批判的稀稀疏疏的几位红卫兵“小将”，只有我们二人算是“常客”了，工作极为方便，毫无干扰。每天中午，用烧饼、油条充当午餐，喝些馆内提供的开水。生活清苦，可是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的。上面提到的国外许多学者的论著，绝大部分都与敦煌藏文写卷有关，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国外同行间的差距；认识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做一些实际工作，才能在这一领域内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当我们交出为伊朗驻华大使馆所需要的那份关于本教（BON）的文书的解读（英文本又经吴文藻教授和冰心先生审读一通）的同时，又草撰一份“国

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手中传阅。此时,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动手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的草稿抄录成册,交到青海民族学院,由王青山同志、李延恺同志安排以汉藏文两分册铅印,在同行者内部流通。后,陈践同志热情可感,她对此亦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参加此项研究课题,协助我把此书的整理、补充、誊写工作担当起来。最后,交到民族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我国著名的汉藏语专家、古文字学专家闻宥教授(1900—1985年)亲为题写封面。此后,我的有关古藏文研究的另外两书:《吐蕃金石录》(民族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2年,我们又进行了修订增补,出了增订本,并把原卷影印附在书后,提供更多方便)和《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均为闻宥教授题签。他那苍古刚毅、道劲淳厚的笔力酷似他为人之风骨。闻老捐馆,悠悠十三载,风晨雨夕,深为思念。马雍同志(1930—1985年)知道我在译注此书,十分慷慨地把根据巴考等人的法文本已译成汉文的“大事记年”交我参考,也是令人感念的友情。《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汉文译注本问世后,出版三千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是我国关于敦煌藏文写卷的第一本书。何以能有如许读者感到兴趣?事实上,敦煌文书的价值和重要意义跨越几个学科: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学……受欢迎自有其道理在。我们接着又去解读一些历史、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各种文书。这时,由于我有机会数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碰到国外的同行,交流到不少西方同道的作品;又有机会到欧洲去教书,得以访问巴黎和伦敦,亲自去查验、翻阅收藏在那里的敦煌原件;尤其是得到巴黎所藏的,由石泰安教授指导、麦克唐纳夫人(即斯巴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编选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琳琅满目,珠玑毕备。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吐蕃法制考》、《吐蕃官制考》、《吐蕃礼仪问答》、《敦煌藏文写卷〈战国策〉译解》、《敦煌藏文写卷〈尚书〉译解》等等论文就一口气一篇篇做了起来,并相继出版了数本从藏

文方面纂集的专著,除前已提到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外,尚有《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心中才稍稍得到一点宽慰。但是,在工作中每感汉文史料之不足,在解读吐蕃文献时,常有捉襟见肘,空乏无力之感,很希望得到有力的印证。多亏苏晋仁(公堂)先生大力支持,他老先生几乎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细心地整理出两本汉文中有关吐蕃史的最重要著作:《〈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样一来,为我增加了底气。吐蕃史料在藏汉两种文字的文献齐头并进的基础上,就感到充实得多了。就在此时,晋仁先生约我,二人在中央民院合开一门新课——“吐蕃史研究”(一个学期,每周4小时,各讲半学期)。在讲课中,藏汉文史料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效果奇佳。后来我把讲稿选出一部分,定名为《吐蕃文化》,作为史筠同志主编的“民族文库”的一种,于1987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是出来了,但心中却一直不踏实,总感到材料不足,难符书名,譬如,在苏晋仁先生的提醒下,我仅知道在汉文史料中有《西蕃会盟记》三卷、《西戎记》二卷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杂传记类,有名而书已久佚;又,《吐蕃黄河录》四卷,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地理类,也是有名无书;尤其是唐宣索所撰《入蕃纪行图》一轴及《图经》八卷,图文并茂,是研究唐代吐蕃史的第一手资料,令人悬念,其名著录于《册府元龟》卷五十六,但也不见流传于世。故我在《吐蕃文化》无法用其资料,甚觉遗憾。这些亲身体会,使我益发认识到汉文史料的重要,于是便与陈践同志合作,辑录出一部《全唐文全唐诗中吐蕃史料集》,以供研究之资,惜迄今无缘出版,只能藏于篋中。每思之,心中戚然。

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与吐蕃史密切相关的汉文写本,其史料价值之高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心仪已久,但由于各种原

因,迄今难得其要。故当我得知现供职于敦煌研究院的青年朋友杨富学同志正与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李吉和同志合力整理、辑录敦煌遗书中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并加以校注,撰成多卷本《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一书时,就感到特别地振奋。此举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内容丰富的敦煌汉文吐蕃文献,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于道泉先生、王重民先生(1903—1975年)、向达先生(1900—1966年)诸位著宿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作过报导。但形成文字、公诸于世的文献却为数不多。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大乘二十二问》,一卷,见于S. 2674,首尾俱全,尾题“丁卯年(787年)三月九日写毕,比丘法灯书。”另有P. 2287、S. 4297、S. 2707、P. 2835、P. 2690、北位20等号。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问题共二十二个,诸如涅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系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巴宙、上山大峻等学者都曾对该写卷进行过研究、校录。

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P. Demieville 1894—1979年)根据P. 4646号卷子《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若干汉文卷子,撰写出名重一时的《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Paris 1952。又译《拉萨宗教会议》,已由耿昇译成汉文,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于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

以及8世纪汉僧(以摩诃衍为首)和印度僧侣(以莲花戒为首)在吐蕃赞普主持下所进行的“顿”、“渐”之争做了十分缜密而详尽的探讨,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极大的兴趣。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尼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二十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著述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着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这在《辑校》中都有反映。著者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这一见解颇有见地。

再如P. 2555号《诗文集》残卷最早是由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录文后带回北京的。他在1973年顷将一包从巴黎录回的关于吐蕃史的敦煌文书交给我,期望我能进行研究、使用。当时正是疯狂的“文革”期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聊作自我娱乐而已。王先生早在1934—1939年间协助巴黎国立图书馆为伯希和写本编目期间就有计划整理、出版其中的汉文吐蕃史料。万万想不到,1975年间王重民先生竟被迫害致死,过早地结束了他辛勤劳碌的生命。我在悲愤之余,把王先生的手稿录出,找到文物出版社俞筱尧、沈玉成、杨瑾几位好友,请他们设法刊布出来以告慰有三先生的在天之灵。1977年,此稿终于见刊于《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又过了二十多年,王先生的遗愿才由两位年轻学人将其变为现实。喜耶?悲耶?抚今追昔,实让人怆然涕下。

P. 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有

王先生从巴黎携归的录文稿一直珍藏在身边。适巧，邓小楠同志临大学毕业时以此卷的释读作为毕业论文，她持考证、释读的稿子来跟我讨论。真不愧为邓广铭（恭三）先生的才女，其工作非常仔细、认真，所论很有发明，颇具见地。后来，小楠同志的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卷上，题为“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算是践了有三先生的遗愿。

这些诗文在《辑校》中都有收录，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校记和题解中将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的新成果融入其中，很有参考价值。

除上述之外，书中收录的文献还有释门杂文、王锡致吐蕃赞普奏表、牒状、户籍、契约、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等多方面的资料。本书收录全面、校注精审、内容丰富、见解独到，我想这部宏著的出版，必将为今后藏族史，特别吐蕃史、汉藏关系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柱，以推动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为了让关心这一学术领域的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杨富学、李吉和君的工作及其意义，特将自己阅读此书的感受写出来，作为貂尾之续。是为序。

王尧

1999年3月于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寓庐

前 言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一座巨大的古代文化宝藏。这里出土的自十六国至元代的古代写本(少量为印本)为数极为丰富,总数计达五万件以上,其中约有5000余件为古代吐蕃文写卷。除了吐蕃文写卷之外,还有相当多写成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①的汉文写卷,也与唐代吐蕃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有关,它们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唐代吐蕃政策、职官、宗教活动、僧尼组织、寺院经济、文化形态及汉藏民族关系诸方面的情况,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且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由于敦煌文书现大多收藏于英、法、俄、日等国,我国研究者很难参考、利用这些文献,势必严重地阻碍国内藏族古史研究的深入。所以,编纂一部资料详尽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汇编已是当务之急。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内容很丰富,但大多因系手抄文献,错、讹、别字甚多,尤其是那些俗字,更难以辨认,故从释读到录文,其劳动之复杂,如不亲睹敦煌文献,不亲历其事,那是难以想象的。好在这些文献有很多已由国内外学者作过研究、录校,可资参考。若没有他们的劳动,本书的辑录工作是难以完成的。根据目前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将全部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包括佛教典籍、释门杂文、写经题记三部分;第二辑则包括人物传记(包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功德记)、王锡致吐蕃赞普表章二道、牒状、僧尼籍及寺院经济文书;第三辑包括官府档案、经济文书、书仪、陷蕃唐人诗及《悬象占》等,吐蕃占领时期的道教文献及其它,并对全书所收文献进行总结,以探讨其价值。

本辑第一部分包括《顿悟大乘正理决》、《大乘二十二问》、《大

乘经纂要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法成经论目录》等文献，是研究唐代吐蕃佛教及唐蕃关系的重要资料。

如所周知，过去学者对吐蕃时期佛教的研究一般来说都是以藏文史料为依据的。这些著作都为后人所作，乖舛之处及传说内容颇多，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佛教典籍却都是当时历史情况的真实记录。如现存法国的P. 4646号卷《顿悟大乘正理决》，真切地记录了8世纪末在赞普主持下于吐蕃宫廷举行的由数百中国、印度僧侣参加的有关禅的大辩论，是唐代吐蕃佛教研究中弥足珍贵的资料，对研究中国禅宗史及其在西藏的流行都极具参考价值。唐代藏族高僧、著名翻译家法成的著作^①在敦煌也多有留存，本书也择其要者予以收录，这些文献对研究法成本人乃至整个吐蕃佛教都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所选《大乘二十二问》代表了昙旷的佛教思想，《顿悟大乘正理决》反映着摩诃衍的思想，而《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则体现着法成的佛教思想。它们正好代表着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乃至河西佛教的早、中、晚三个时期，其反映出来的也正是中原佛教与吐蕃佛教间的接触——排斥——融合过程中的不同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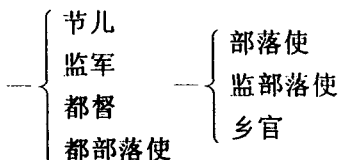
昙旷本为河西僧人，后入长安西明寺专攻《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经》，成为唯识宗信徒，但他晚年应吐蕃赞普墀松德赞（755—797年）之邀而撰写的《大乘二十二问》却明显地表现出禅宗意识。此后，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原佛教不断向河西渗透，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便引起以摩诃衍为代表的中原禅宗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教的大辩论。赞普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倾向于印度佛教，导致了摩诃衍的失败。《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的正是这次辩论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禅宗与印度佛教在教理上的分

歧,这次辩论成为吐蕃佛教与中原佛教走向不同方向的分水岭,此后,河西佛教与中原佛教同步发展的局面被打破了。中原地区仍以禅宗为主,而河西佛教界却出现了唯识宗复兴的局面,其代表人物就是法成。吐蕃佛教的特点渐次形成,并日益明朗。^⑧

以上所述反映着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乃至河西地区正统佛教的发展轨迹,而同时期民间佛教的状况,我们又可通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为数丰富的释门杂文反映出来。书写于吐蕃统治时期的释门杂文种类很多,有愿文、燃灯文、转经文、行城文、道场文、思文、亡文、置伞文、印沙佛文、释门文范等,本书收录了其中的63件(此外还有部分文书未全录,仅录出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附于相应文献的题解中)。这些文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民间的流行和世俗化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吐蕃赞普当时在沙州民众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敦煌出土释门杂文中,除对赞普的歌颂、祝福外,常提到的吐蕃官员也不少,计有瓜州节度使、东军将相、河州节度使、乞律本、节儿、监军、都督、部落使、都部落使、判官、乡官等官员及敦煌佛教教团的番大德、番教授、都僧统、僧政、法律等僧官,还有道场主办者、法会施主、法会主持人的名字,并对其功德、政绩、学业、品行都有所叙述,字里行间,反映着吐蕃统治河西时期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情况。至于上述官员之地位,史乘一般很少载,然据敦煌文书,即可大致予以定位,其关系大致有如下述^⑨:

东军将相(河州大节度使)——瓜州节度使——乞律本



这一定位对研究吐蕃古代历史是颇具意义的。

敦煌发现的时属吐蕃时期的汉文文书中,不少都有确切的纪年题记,今择其中内容较为重要的予以辑录。

在录校文献时,我们遵循学界常用的体例,用〔 〕表示拟补文字,用□表示残缺或无法认出之字,每一个□表示一字,若无法确定其字数时,则用—□、—□或—□表示前缺、中缺或后缺;当原文有错、讹、俗字时,凡能测定当作某字时,则在原字后加一()而填入校定之字;原文残缺,但能补出者,则用□()表示。敦煌文献,不管写本或印本,满篇都是俗字(不规范之字),与今天通行的繁体字差异甚大,录校时无法悉数保留,故径改常用俗字为通行字以便印刷。

由于本书所收文献有的较长,有的又很短,为便于阅读,我们录文时未一一标明文书的行数(第二辑、第三辑的情况与之不同,需按行录文);录文时不以某一写本为底本,而是综合各本,择善而从,然后在校记中录出异文,以便稽核。

注释:

①参见陈海涛《吐蕃统治时期的河西佛教》,兰州大学历史系1994年硕士论文。

②王尧《吐蕃译师管·法成身世事迹考》,载氏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3页;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的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84—246页。

③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学界众说纷纭,计有大历十二年(777)、建中元年(780)、建中二年(781)、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贞元三年(787)、贞元五年(789)等多种说法。此从贞元二年敦煌陷蕃说。详见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时代》,榎一雄编《讲座敦煌·2·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97—198页;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

前 言

第1期,第1—7页。

④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第44—54页。

目 录

序	王尧(1)
---------	-------

前言	(1)
----------	-----

一、佛教典籍	(1)
--------------	-----

大乘二十二问	(3)
--------------	-----

顿悟大乘正理决	(38)
---------------	------

顿悟大乘正理决·长编	(71)
------------------	------

大乘经纂要义	(76)
--------------	------

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81)
---------------------	------

大乘四法经	(85)
-------------	------

大乘四法经释	(87)
--------------	------

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	(90)
--------------------	------

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	(106)
------------------	-------

叹诸佛如来无染着德赞	(143)
------------------	-------

瑜伽论卷第十四手记	(145)
-----------------	-------

法成经论目录	(178)
--------------	-------

二、释门杂文	(181)
--------------	-------

愿文(P. 2341)	(183)
-------------------	-------

愿文(S. 6315)	(185)
-------------------	-------

愿文(P. 2255、P. 2326、P. 2358)	(186)
-----------------------------------	-------